

苏联与中国抗战

——以万家岭大捷为例¹

孙 伟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教学科研部，江西 井冈山 343600）

【摘要】：苏联对日本侵略中国有两种态度，一方面希望稳住或不过分刺激日本，不给其过早侵略苏联的口实；另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尽可能长久地拖住日本，使之陷入中国的泥潭，无法入侵苏联。加之蒋介石频繁要求援助常态化，使得苏联以各种方式对中国正面战场给予了大量的支援，促使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显著增强。苏联对万家岭战役的关注与帮助有：战前的善意提醒、对前线驻军的改进建议、对军需物资的供给、对战役进程的关注。苏联对万家岭大捷的高度评价，是对中国军民抗战的鼓励和支持。

【关键词】：苏联；中国；抗战；万家岭大捷

【中图分类号】：K2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7）06-0077-07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这除了国共两党摒弃前嫌进行第二次合作，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杀敌外，也离不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即离不开外部因素的作用。其中，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当时的世界强国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帮助与支持很大。江西德安的万家岭大捷是抗战初期一次非常著名的战役，被叶挺称为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1]（P90）}。目前对该战役的研究多从具体经过、取胜原因、历史地位等方面展开。^②本文则以万家岭大捷为例，进一步审视苏联对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影响。

一、苏联对中国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支援

1937年7月1日，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抗战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阶段。在此期间，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尚未建立，中国政府和人民独立抵御着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此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态度如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苏联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两种态度

七七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大举入侵，使英、美在远东的利益受到了相当大的威胁，然而两国态度却很暧昧。一方面，不时地作出某种姿态，发出一些不痛不痒的警告，妄图遏制日本扩张的势头；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维持对日关系作为其远东政策

¹**【作者简介】**：孙 伟（1980-），男，江西德安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

²①王需民《试论抗战初期德安境内的万家岭大捷》（《求实》，1955年第10期）、郭代习《万家岭战役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敖文蔚《武汉会战万家岭大捷原因论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4期）、余伯流《中国抗战时期三大名战之一的万家岭大捷》（《党史文苑》，2009年第3期）、舒醒《万家岭战役：中国抗战史上的空前胜利》（《党史文苑》，2010年第21期）。

的基本出发点，尽力避免对日关系破裂。因此，仍旧无限制地满足日本对于军用物资的需求，又以“中立”和“不干涉”等种种理由拒绝为中国提供任何帮助，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希望促成中日之间达成妥协。可见，美、英对日采取了纵容的态度，对中国更多的是道义上的声援。

苏联本来寄希望把英、美拖到共同援助中国、牵制日本的局面，以达到苏联最理想的远东安全模式，但是由于英、美的态度最终阻碍了这种可能。这样，导致苏联在对华援助的问题上不会走得太远。

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最关键的第二条这样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2] (P1105)} 依此条款，中国受到日本的侵略时，苏联保证不会给予日本任何形式的援助。斯大林在后来也表示，除非英、美参战或者日本侵略苏联，苏联才会出兵。

其实，苏联与日本的关系也处于矛盾之中，即一方面希望稳住或不过分刺激日本，不给予其过早侵略苏联的口实。这倒不是因为苏联惧怕日本，而是避免德、意和日本从西东两面同时构成威胁。

另一方面，苏联又深知日本的侵略本性，两国的国土距离太近，日本所作的不侵略苏联的承诺根本不可靠。苏联不希望看到落后的中国迅速地被日本占领，或者轻易地向日本投降，而希望日本陷入中国的泥潭，无法腾出手来进攻苏联。这样，虽然与英、美一样，对日政策采取“国家利益至上”的方针，但为了自身安全的考虑，苏联作出了更切合本国实际的策略，即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进行较大的援助，这也直接帮助了中国初期的抗战。

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可以反映苏联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双重态度。一次，日军在华作战时击落一架飞机，后查明该机为苏联飞机，俘获的飞行员也交代曾服务于苏联军队。1938年4月3日，日本大使重光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抗议，“细考苏联体制，此事发生殊觉遗憾，苏联政府应负重大责任”。

李维诺夫答复主要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苏联政府对于出售军火以及飞机至中国问题之见解，完全依照一般公认之国际法标准，此点已经苏联驻日大使斯拉伏茨基与广田外相谈话时加以说明，因是，此项问题，已不必再行论及，盖军火之供给中国，一如若干国家以军火供给日本。”苏联卖武器给中国，如同英、美卖武器给日本，都符合当时的国际法，日本没有理由干涉。

第二层：“关于在华逮捕苏联机师之供认，我人尚毫无所闻，提苏联政府于此对日不负任何义务及受任何国际条约之束缚，因苏联未派军队及任何独立部队前往中国参战，凡与此种事实相背之各种供认，均不能承认。”“日政府当亦深悉各国现有一相当数目之外国志愿兵服务于中国军队中，就目前所知，日政府亦未见对有国民在中国军队中服务之外国有所声明，显然的，是认为此举无法律依据。”苏联并未派兵来中国，有些人自愿来中国，日本如果干涉，缺乏法律依据。

第三层：“据日当局以前担保，谓日不拟对华作战，迨战争发生，日本又再三声明，系‘偶然事件’，两独立国间既未进入战争状态，故苏联不负任何责任。”^[3] 日本未承认侵华罪行，那么中日之间的战争，苏联不负责任。

上述三层答复有力地驳斥了日本的抗议，辩护了苏联飞机援华的既定事实。同时，也反映了苏联的矛盾态度，既想帮助中国抵制日军，牵制日军，又不希望与日本过早进入敌对状态，关系交恶。

（二）蒋介石频繁要求苏联援助常态化

苏联答应帮助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频繁地请求其对中国进行援助，以增强中国政府的军事力量。中国的军事基础非常薄弱，兵工生产严重不足，特别是航空制造滞后，军火严重依赖进口。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又不能从英、美那里获取实质性帮助，所以蒋介石一直希望能够得到苏联在军事上的援助，包括签订军事互助协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关系趋于缓和，蒋介石开始放心大胆地寻求苏联的援助了。

蒋介石于 1937 年 8 月 20 日给驻苏大使蒋廷黻发电，要求他向苏提出购买大批飞机：“沈德燮处长想已到莫，请兄介绍其与俄政府洽商飞机交涉，现最急需者为驱逐机二百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一百架，先聘俄飞行员二、三十人，即请其驾驶飞机到甘肃后，再飞回新疆驾机回甘，如此不过十余次即可运完也。”^[4] (P465)

1937 年 11 月 26 日，日军即将进攻中国的首都南京，蒋介石非常焦虑，他通过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转呈斯大林，希望苏联能派部队直接参战，援助中国抗日：“现在，中国军队在最大限度地做出最后努力的同时，在进行着撤退，但仍保卫着南京。我希望友好的苏联将给予中国重大的援助。如果此时此刻为挽救东亚的危险局势您决定派出您的部队，那么这一决定将加强中苏之间永远合作的精神。上述一切完全有赖于您，也只有您能解决。”^[5] (P93-94)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于 1938 年 5 月 10 日致电蒋介石，对于中国的请求给予明确答复，表示将尽其所能给予援助：“关于苏联方面援助一节，丝毫不必疑虑，苏联当【尽】其一切可能，援助在反抗侵略者的英武解放斗争中之伟大的中国人民。阁下所要求之飞机，当即运送。关于给予中国以新信用贷款问题，将付苏联最高机关讨论，吾人希望能底于成。”^[6]

针对中苏谈判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情报的泄露，引起了苏联方面的高度重视，并向中国方面提出了警告。1937 年 8 月 22 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致电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指出：“在您同蒋介石或他的亲信谈判时请坚决指出，泄露我们的谈判可能引出因受日本及其友国其中可能也包括英国的影响，说不定会出现类似对付西班牙的情况，即提出停止向日本和中国出售及运送武器的问题，要求他们对此事的进行严守秘密。”^[7] (P106)

当然，慷慨的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无偿的。斯托莫尼亚科夫于 1937 年 8 月 21 日致电鲍格莫洛夫，指出：“请告知中国政府，经再次讨论后，我政府已决定同意中国的要求、并同意中国政府收到货物后延迟一年开始偿还向他提供的贷款，以便在后五年每年偿还同样数额的借款。贷款总期限为接货后六年。”“作为我们提供的武器等价物，我们想得到相当贷款总额 3/4 的金属（锡、钨、锑、铋）和 1/4 的茶及其他中国货物。”^[7] (P105) 可见，苏联希望从中国获取大量对战争具有战略价值的矿产品及其他农副产品。

由于各种原因，比如战争阻扰和日军的禁运等，导致中国答应给苏联的货物没有及时运到，这引起了中苏双方的高度关注，因为会影响苏方后续援助的履行。1938 年 4 月 7 日，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卢干兹致电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指出：“要蒋介石注意，迄今为止，中国方面没有起运任何苏联预定发送的货物。蒋介石声称，他近日已发出指示，开始装运，并筹备以后的物资起运。同时由双方代表确定今后发运货物的方式。”^[7] (P130)

（三）苏联的援助促使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显著增强

对于苏联提供的各种援助，虽然中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当时代表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还是非常感激，他在给苏联的电文中也流露出少有的谦恭，对斯大林个人及中苏关系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比如，1938 年 5 月 5 日，蒋介石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这样说道：“由于你们多次给予了全力支援，中国在对日作战中才能坚持到现在。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对于贵国的互助精神和支持弱小的行动，不仅我个人感激不尽，所有的官兵和人民大众也都无限钦佩和感激。”“我们认为，中苏之间的关系超出了一般友好关系的范围。中国和苏联是患难与共的朋友，我深信您亦忧我们所忧。”^[5] (P191)

与大革命时期非常相似，抗战时期的苏联同样“重国轻共”，将其军事援助基本上都给了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苏联极度轻视共产党的实力，并没有因为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给予支持，中共对此颇有微词，作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李德描述了延安当时的普遍心情。苏联“为中国的军队提供了不可低估的、间接的军事援助”，“苏联的物资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政府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来的主要是急需的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的、当然也有斯大林的讲话和著作……在延安出现了许多刻薄的讥讽，诸如‘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8]

(P262-263)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说道：“过去的，大家都明白，各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援助中国的，主要是其人民的同情中国，苏联的援助则更加积极”，“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友谊是增长的”。^{[9] (P194-195)} 毛泽东含蓄地批评英、美对中国主要是道义上的援助，而苏联的援助很多。然而，作为一位政治上成熟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对于苏联的“偏心”做法没有表现明显的“不悦”，也没有发表不利于团结的评论。因为一方面，除武器外，中共还需要苏联和共产国际其他方面的指导；另一方面，站在国家利益和抗战大局的角度，武器都给了国民党，其实也是中国国防力量的增强。

在苏联的帮助下，以及残酷战争的锻炼下，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不断增强，苏联的H·H·波波夫上校于1938年4月25日发表文章给予高度评价：“到1937年上半年前，中国已拥有一支较1936年组织得更完善、纪律更严明和装备更精良的军队。”“最近，中国军队的技术准备有了显著提高。过去中国一个较好的步兵师只有七十二挺轻机枪、二十四挺重机枪、三十个掷弹筒和十二门大炮，现在一个师的武器装备已经大大增加了。正因为如此，日本军队在自己后来的进攻中，为了冲破中国的防线不得不大量使用火力很强的武器。”“在中国作战的日本军队平均每天要损失二千一百人左右。”“现在的中国军队已拥有足够的高射炮和空军”，“日本军队从1937年8月15日到1938年5月1日这段期间，至少损失了五百一十三架飞机。现在中国已不再处于被动地位，它已经能够主动出击了，而且在一般情况下能够打退日机的进攻”。^{[10] (P312-314)} 可见，中国军队的进步是全方位的，武器弹药、飞机都得到了极大提升，特别是控制了部分制空权，使得日机不像当初那么嚣张，还让日军每天都要付出极大的人员代价。

总之，在抗战初期，尽管国民党寄希望于苏联正式出兵援华的情景没有出现，但是，苏联政府却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成为直接向中国进行援助的唯一国家。它以各种方式对中国正面战场给予了大量的支援，比如提供巨额贷款，提供大量的军事物资，派遣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直接到中国参战等，这些都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抵抗能力，激励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二、苏联对万家岭战役的关注与帮助

从1938年6月至10月，中日双方爆发了武汉会战，其规模之大、战线之长、伤亡人数之多都是空前的。具体来说，9月25日到10月17日的万家岭战役历时20余天，成为影响武汉会战的关键一役。在这四个月里，尤其是日军对德安展开猛攻后，苏联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这场战役的关注与帮助。

（一）战前的善意提醒

1938年1月至6月，徐州会战爆发。就在这次会战结束后不久，苏联就敏锐地注意到日本下一步进攻汉口的企图，并及时提醒中国政府务必予以高度重视并做好防御准备。

H·利亚霍夫于6月5日《在中国的前线——军事行动评述》一文中指出：“根据种种迹象判断，日军司令部打算向汉口方向进一步展开攻势，其目的是占领这个城市。显然，日本人为着这一目的，将竭力向郑州（陇海铁路与京汉铁路交叉点上的城

市)靠拢,以便从郑州沿铁路线向汉口进攻。为了同一目的,日本人还在长江芜湖地区集中了火力很强的内河舰队。可以预料,日军司令部打算沿南北两路,即沿长江和京汉线进攻汉口。”^{[10] (P332-333)}

上文发表后近一个月的7月1日,随着形势的日趋明朗,H·利亚霍夫在肯定自己判断的同时,又稍微修正了自己之前对日军进攻武汉线路的分析:“日丰司令部便准备进行一场新的战役,其目的是夺取汉口。考虑到作战地区的地形特点和日军所进行的部署,可以预料到日本人有可能从两个方向进攻汉口:一个方向是沿平汉铁路从北部进攻;另一个方向是沿长江从东部进攻。这样一个作战计划极有可能实现,因为它可以把正面的进攻与舰队的打击结合起来。”他进而提出,日军在向平汉路进攻时,在河南省遇到多方面的困难后,马上改变了战术,准备像占领上海、南京那样,沿长江展开主要的攻势。

因此,他断言:“日本人最近暂时停止在平汉路方向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而把主要的进攻力量调到长江的安庆地区,这就证明了那样一种推测,即正是这个方向逐渐成为日本人夺取汉口的主攻方向。”^{[10] (P343-344)}通过指出日军进攻汉口的方向为东面,也就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对赣北战场进行提前重点防御的必要所在。

(二) 对前线驻军的改进建议

7月12日至8月7日,国民党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部苏联顾问保葛达诺夫上校,奉命在南昌与第一兵团司令部各高级将校会晤后,从南昌出发先赴七十四军五十四师及五十八师防地,后赴六十六军一五九师防地一部,进行实地视察。结束后,就南浔铁路前线的国民党驻军的缺点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南浔铁路是当时江西交通的大动脉,贯穿江西北部,北起九江,南抵南昌。其中,德安县为贯穿其间的重要区域和站点,交通非常便利,因此迅速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在这份蒋介石致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的电文中,除了希望他与徐部长切实研究,通令各总司令、各军师长切实改正外,还特别提到了该顾问的信息,如幼年曾参加欧战,充当机关枪手;壮年参加国内战争,作战经验丰富;革命成功后,复入该国陆军大学深造,学科亦颇有根基,与中共无关系。

该建议共十八条,非常专业,对于前线驻军在短时间内提升战斗力、加强协作、注意保密、收集情报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比如,“各阵地构筑,应自挖土起,再加伪装”,“轻重机关枪,及小口径炮阵地,射角太小,不能发挥其整个威力”;“炮兵与步兵,须有协同动作。各指挥官尤当特别清楚彼此情况”,“与友军防守一地时,指挥官应彼此密切联络”;“各小部队作战时,在短距离内,应利用旗语,以代传令”,“各军师旅团等番号及驻在地点,应该用暗号,以防传令时敌人间谍在电话上窃听”;“各军谍报通讯不健全,应速设法整理”,“各军多无武装情报侦察搜索队”。^{[5] (P237-238)}

(三) 对战争军需物资的供给

其实,进入6月份武汉会战以来,国民政府一直在向苏联借钱。中国驻苏大使杨杰具体负责此事,他在与蒋介石的电文中,主要集中在中苏第一、二次借款条约与中苏合办飞机厂等事宜。从蒋的语气来看,如“为何如此迟延”“速办”等字样,反映出他的焦急之情。

8月11日,中苏双方签订了5000万元美金的信用借款条约,用以购买苏联制造之工业产品和工业设备,为期五年,利息为年利三厘,中方以苏联所需之物产品与原料品偿还之。

随着武汉会战的日趋激烈,对苏联物资的需求更加迫切。蒋介石在8月17日给杨杰的电文中指出:“各种货品务于九月中旬运到香港,以资决战,以大战时期必在九月中旬也。此战关系最后之胜负,请以此意转告伏帅,务请设法协助我能如期运到也。各种飞机应用甚急,更望速运为要。”^{[5] (P239)}

蒋介石似乎还是不放心的，同日他在致伏罗希洛夫元帅并转斯大林的电文中，用近乎恳求的语气写道：“现第二期借款之约，业承签订，我方所希望供给之物品，亟盼迅即起运来华，预料敌人在九月内必倾全力进攻武汉，九月中之决战，将为中国抗战与东亚安危一最重要关键，故亟盼贵国所允接济之武器，务于九月中旬如数运到，以供此一重要决战之应用，各种飞机待用尤急。”^{[5] (P240)}

8月23日下午，苏联方面终于有了答复，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受到苏联驻华大使两个小时的约谈。结束后，他向蒋介石提供了这样的信息：“据莫斯科电告，俄方已允日内起运驱逐机百架来华，照所开货单，以后尚有大批续运，拟请催运，并拟请仍派志愿军来华，我方拟接收半数。”^{[5] (P242)}在中方的多次催促之下，终于等来了苏联援助的大批飞机和飞行员，这些人员与物资直接用于支持已经爆发的武汉会战，其中很多武器自然也投入到万家岭战役之中。

（四）对战役进程的关注

武汉会战爆发后，苏联方面对战事的进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H·利亚霍夫于9月19日撰文写道：“7月28日，日本人的登陆部队在舰队的配合下占领了九江。在九江通往汉口的道路上，日军陷入了不能使用机械化装备的山地。日本军队距离汉口越近，他们所遇到的来自中国防御部队的阻力就越大。整个8月一个月，日本人的进展不大。同时，中国司令部还及时地估计到日本人有可能在南昌南面发起进攻，并把新部队集中到这一地区。尽管侵略者大规模地使用毒气和化学武器，但仍然没有摧毁中国的抵抗。”^{[10] (P386)}

九江被攻占后，日军便沿长江南岸西进武汉，以成大包围之势。赣北地处武汉外围，成为日军的必经之路。日军投入进攻的是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国民党也有两个兵团把守，第二兵团布防于瑞武公路及沿江各要点，第一兵团担任“南浔正面金官桥、德安等地之守备”，^{[11] (P40)}薛岳担任总指挥。日军进军途中，陷入了中国的山区，特别是万家岭一带，重峦叠岭，地形复杂，山路崎岖，机械化部队难以发挥优势。可以说，日军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中国守军的极大抵抗。

日军一零六师团从九江沿南浔铁路南犯，企图攻占德安县城，夺取南昌。原本希望铁路沿线易于运兵，迅速发动进攻，不想孤军深入群山峻岭之间。由于道路情况恶劣，运输难以为继，导致日军步履维艰，弹药和粮食供给出现极大困难。双方在德安一带发生激战，形成胶着状态。正如文中所言，日军在8月份都没什么大的进展，气急败坏之余，在德安等战场甚至还使用了化学武器，但这并没有摧毁中国军人的斗志。截止H·利亚霍夫文章发表时，战争即将进入白热化，双方不断集结重兵，进行包围与反包围，艰苦卓绝、轰动于世的万家岭战役即将打响。

三、苏联对万家岭大捷的高度评价

万家岭战役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捷报传到后方，举国欢庆。国内各电台、报刊都以显著标题对万家岭大捷进行广泛宣扬，许多城市举行了祝捷大会，各地党政机关、军政要员和各界团体纷纷发去贺电，此役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决心与信心。与此同时，也获得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赞誉，如外国《士米斯报》这样评价：“南浔一线，德安大捷，使敌军对汉口之前进，受极重之打击，可为今后史家大书特书。”^[12]同时，苏联也在第一时间给予了高度评价。

就在主要战斗刚刚结束，中国军队主力尚未完全撤离战场之时，10月12日，H·利亚霍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为汉口而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武汉保卫战的最新战报，特别是向苏联及全世界播报了这一重大利好消息。由于对万家岭这个地名还不熟悉，所以文中都用德安的字眼进行表述。

一方面，介绍了中国军队在德安战役中取得的巨大胜利，以及日军遭遇的惨败。“电报传来长江前线的中国军队在德安附近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中国军队成功地包围和全歼了日本一零一师团和一零六师团的两个旅团。日本在德安的失败，再一次

把国际舆论界的注意力吸引到日本进攻汉口的进程上来。”总之，四个月以来，日军在沿着长江通往汉口的要道上遇到了严重的障碍。

另一方面，指出了此役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随着前线伤病员增多和物资供给中断，日军出现了兵员不足及从日本调来的增援部队作战能力大大下降的现象，这也成为此役日军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日军在汉口附近的损失迫使它把大量的新兵从日本调往中国。最近三个月来，日本司令部不得不再扩充几个新的师团，并把他们调往大陆。目前，日本在不断地征集预备兵，并通过短期培训将他们派往前线。日本国内各地都在征集预备兵，其人数已达几万人。因作战部队的粮食供应经常中断，加之战斗情况日益复杂，在日本军队中已出现流行病。这样，日本人除了伤亡之外，还不得不从前沿阵地撤退大量的病员”。^{[10] (P388-390)}

10月16日，万家岭大捷基本上尘埃落定了，前线的战报特别是相关统计数据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M·季霍米罗夫进而发表《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损失》一文。该文同样没有点出万家岭这个地名，先是对日军进攻武汉进行了戏谑，再对德安战役中日军遭受的人员损失做了精确的介绍，并将其与此前半年的台儿庄战役相提并论。“最近日本人夸口说：八月底以前他们将占领汉口，后来又把这个期限推迟到十月中旬。现在这个期限已经到了，但是汉口仍然掌握在中国人手里。日本人在德安地区发动的进攻也很不顺利。从10月9日深夜到次日，日本人在德安地区损失了两万人。德安给侵略者带来了极大的失望，这和三月底台儿庄战役后的情况很相似，在那里中国军队击溃了日军两个师团。”

另外，该文还指出，对于日本而言，随着“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并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加剧侵略者的经济和财政灾难”。日本国内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对工人、农民、小商人、小业主、手工业者乃至警察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还出现了士兵暴动。“这就是日本军阀在中国贸然进行军事冒险的一些严重后果。”^{[10] (P391-394)}

总之，苏联在对万家岭大捷作出高度评价的同时，也剖析了其深层次的战争规律，即由此对日本产生的负能量，以及对中国产生的正能量，双方力量发生了此消彼长的态势。其实，这也是苏联官方舆论通过对这场战役的充分肯定和深入宣扬，对中国军民的继续抗战进行鼓励和支持，胜利必将属于中国。

四、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影响

综上所述，苏联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对中日双方在不同阶段有过不同的外交策略，但从客观上看，苏联对中国的抗战是积极支持的，对中国人民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援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提供各种武器和经济援助，直接提升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苏联阶段性地有偿提供的各项援助，使得贫穷落后的中国有能力与日军抗衡，缩小了武器上的差距，为中国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直接派兵援助，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宝贵的建议、指导和情报。派遣大批飞行员到中国直接参与抗战，有力打击了日军的空中力量。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情报反馈给中国，为中国战场的布局和防御等出谋划策。

再次，对中国抗战的阶段性或局部性胜利予以了极高的评价，对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予以坚决的回击和抵制，使得即使国民党政府内时常出现不和谐的因素，但有所忌惮，终究没有离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

最后，中国抗战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的不怕牺牲、坚持不懈，外因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中国国土广袤，广大军民抗日之坚决，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对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才赢得了苏联等许多国家的尊重，反过来也推动了外部因素作用的放大。同时，中国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向苏联源源不断地提供了矿产品和农牧产品，也援助了苏联的卫国战争。

[考文献]:

-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德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德安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Z]. 内部资料, 1985.
- [2]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Z].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2.
- [3]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驳斥日本政府抗议苏联飞机援华[N]. 新华日报, 1938-04-06.
- [4]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 战时外交(二)[Z].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
-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0卷)[Z].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
- [6]孔庆泰. 抗战初期杨杰等和苏联磋商援华事项秘密函电选[J]. 民国档案, 1985, (1).
- [7]李嘉谷.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Z].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 [8](德)奥托·布劳恩. 中国纪事[M]. 李逵六, 等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4.
- [9]毛泽东军事文选[M].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81.
- [10]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 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 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3辑)[Z].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 [11]薛岳, 等. 武汉会战[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0.
- [12]外报论战局前途[N]. 新华日报, 1938-10-28.